

与《儒林外史》《红楼梦》同出于18世纪的长篇小说《歧路灯》,《国朝中州诗钞》的辑纂者宝丰杨准称其为“醒世之书”。“醒世”者,警示世人醒悟者也。

创作《歧路灯》的动因蠡测

李绿园的祖父李琳出身于河南洛阳新安马行沟一卑微知识分子家庭,因遭遇灾荒,流落到宝丰溧阳水牛屯,靠教书谋生。到了李绿园父亲李甲,方在曹镇宋寨治下些许产业落户。经三代人的不懈努力,李绿园得以参加河南乡试考中举人。

青年时代的李绿园因忙于追求功名,对第一房夫人余氏所生长子李勉失于管教,李勉上学不成出现性格缺陷,与村上王某发生争执,洒石灰伤了王某眼睛,王某告到官府,李勉被判充军陕西,后转开封服刑,瘐死开封监狱。这对李绿园触动很大,子孙是家庭的未来和希望所在,观念深深地埋入他的心底。

余氏病逝后,李绿园娶了第二房夫人潘氏。潘氏为李绿园生下次子李莲,李绿园对李莲的教育抓得非常紧,李莲得以顺利通过府试成为生员,通过乡试考中举人,乾隆四十年(1775年)通过会试殿试点为二甲进士,初任吏部主事,递升文选司员外郎、郎中,后出理江南七省漕务,获光耀李家三代殊荣,祖父李甲、父亲李绿园皆诰赠中宪大夫,就连瘐死狱中的长兄李勉也获朝议大夫敕赠,雪了李勉失教给李家带来的耻辱。

传统士人的人生追求是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的“三不朽”。立德、立功需要天时机遇,不是每个人想求就能求到的,而立言则是每一个士人都能做的。既有教子失败的教训,又有教子成功经验的李绿园遂产生了著一部书,为子孙立下训育之言,为乡里士人立下理家治家齐家之想。于是就有了以“用心读书,亲近正人”为思想砥柱的《歧路灯》的创作,欲“藉科诤排场间,写出忠孝节烈,而善者自卓千古,丑者难保一身,使人读之为轩然笑,为潸然泪,即樵夫牧子,厨妇嫠嫠,皆感动于不容已”的书。李绿园在《<歧路灯>自序》中说:“予朱子曰:善者可以感发人之善心,恶者可以惩创人之逸志。友人皆谓于纲常彝伦

用心读书 亲近正人

——李绿园与醒世之书《歧路灯》

潘民中

间,煞有发明。”立言之意可谓得矣!

《歧路灯》的价值判断

《歧路灯》除了启发、诱导士家子弟用心读书、亲近正人、排除干扰,走人生正道这个主观价值外,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还有反映18世纪中国省会城市市井生活画面和暴露中下层官僚家庭腐败状况这两个客观价值。

18世纪的中国文坛上出现了3部长篇小说:《儒林外史》《红楼梦》《歧路灯》。这三部小说,《红楼梦》不言故事发生的朝代,《歧路灯》所叙人事假托明朝嘉靖年间,《儒林外史》则假托明朝初年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间事。不曾注明朝代或不注明朝代,事实上反映的都是作者所处的18世纪清王朝乾隆年间的社会现实。

时间条件明白了,那么说空间。《红楼梦》情节展开的空间是京城皇亲国戚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的兴衰变迁。《歧路灯》是以河南省省会开封为舞台,描摹出一幅开封市井生活风俗画。《儒林外史》中人物主要生活在江南,虽也曾到过杭州、南京,但更多的是在府县民间。上有京城,下有府县,中有省会。京城是独一无二的,府县则是江南最有代表性的。而清朝18个省18个省会,河南省省会开封是可以作为集中代表的。这样就把18世纪中国全方位的空间涵盖了。

《红楼梦》叙写了皇亲国戚大家族的兴衰荣辱及一帮公子小姐的聚散离合,从而揭露了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王朝高层社会的种种黑暗和罪恶及其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对腐朽的统治阶级和行将崩溃的制度作了有力的批判。《儒林外史》以辛辣的笔触对底层儒士命运进行了揭露,形象地刻画了科举制度对底层知识分子的摧残和文化教育腐朽糜烂的现状,从而对当时的吏治腐败、科弊弊端、礼教虚伪等进



李绿园故居里的主要建筑今有轩 王宝郑 摄

行了深刻的嘲讽。《歧路灯》则客观地暴露了生活在河南省省会开封的中下层破落官宦家庭浮浪子弟靠坑蒙拐骗,以维持吃喝嫖赌生活的斑斑劣迹及其腐朽的精神世界。这样就上与《红楼梦》相承,下与《儒林外史》相接,共同构成了展示康乾盛世光鲜表面下上中下三个阶层社会溃败的严重性,使读者预感到清朝作为最后一个封建王朝必然走向覆灭的命运。

《歧路灯》早期传播路径梳理

《歧路灯》像《红楼梦》《儒林外史》一样,成书之后早期都是以抄本的形式小范围传播,然后才有了印刷本,但《歧路灯》的初印本较《红楼梦》《儒林外史》要晚得多。

《红楼梦》最迟在曹雪芹病逝的乾隆二十八年(1763年)成书,它的初次刻印本是乾隆五十六年辛亥(1791年)萃文书屋活字本,由程伟元、高鹗整理出版,以抄本形式传播仅30年。《儒林外史》成书于乾隆十四年(1749年),初刻于嘉庆八年(1803年),以抄本形式

传播也不过50年。这与其以抄本形式传播地域的文化氛围有关。《红楼梦》以抄本形式传播的地域主要在北京,北京人文荟萃,一旦在文化人中传播开,就有人想到整理印行。《儒林外史》以抄本形式传播的地域主要在江南,江南是文化繁盛之区,刻书业又发达,只要有阅读市场,就会有人将之刻印出版。

《歧路灯》成书于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为民间亲朋好友转抄,先有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李绿园在新安教书时的学生过录本,该过录本卷首附有过录人《题语》。后在洛阳及沙河两岸宝丰、鲁山、叶县、襄城县、郟县一带渐次转抄,可知者有洛阳杨家抄本、汝州张官营(即今鲁山张官营,清代直属汝州,民国初年至二十三年属临汝县辖)张氏抄本、余氏抄本;宝丰马街司家抄本等。

道光年间(1821—1850年)原稿流转至李绿园孙子李于潢的朋友宝丰杨庄杨准家,杨准于道光二十三年(1843年)编辑成书的《国朝中州诗钞》为李

绿园立有小传,称:“又著有《歧路灯》一书,历三十年,凡数十万言……书稿流转归淮家。”

1919年蒋瑞藻编辑出版的《小说考证》录《缺名笔记》语称:“吾乡前辈李绿园先生,所撰《歧路灯》一百二十回,虽纯从《红楼梦》脱胎,然描写人情,千态毕露,亦绝世奇文也。惜其后代零落,同时亲旧又无轻财好义之人之为之刊行,遂使有益世道之大文章,仅留三五部抄本于穷乡僻壤间,此亦一大憾事也。”此《缺名笔记》不留撰者姓名,难知为何时人,但从行文之口气看,不出清末道咸至民初五年间人。清代河南在文化氛围上不仅与北京没有一比,与江南比也是有点儿呆滞的,故“无轻财好义之人之为之刊行”。

《歧路灯》的初印本在其成书140多年后的1924年才由洛阳杨懋生、张青莲、冠道斋、李仙园、李斌廷诸友人合作共助,将杨懋生家藏抄本由洛阳清义堂石印发行,进入学者视野。

我与《歧路灯》的缘分

1980年中州书画社出版发行了栾星先生点注的《歧路灯》,当时我正在开封师院历史系读书,知道此书是宝丰曹镇宋寨人李绿园以开封为故事发生地写的。当我发现书店里上架这套书时,立即就买了一套,有滋有味地读了一遍。后来还买到与之配套的《歧路灯研究资料》,对《歧路灯》的作者李绿园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的第二房夫人潘氏是鲁山漫流潘烈的女儿。李绿园曾在漫流他岳父家住过一段时间,而我家与漫流仅一岭之隔,况且我的八世祖潘勖是潘烈的叔伯弟弟,就感觉更亲切了。因此,我把《歧路灯》和《歧路灯研究资料》当成了最珍贵的藏书。

1985年,我调来平顶山,从《平顶山文史资料》上读到一篇谈李绿园家

世的文章,署名“李春林”,知道李春林是李绿园的七世孙,还健在,就抽空到宋寨拜访李老先生。当时,李绿园的书房“今有轩”东端一间屋顶露出了天,但中间和西面还完整,李老先生就住在里边。当门靠西侧摆着一张桌子,上边放着书和纸张。我和李老先生攀谈了一阵,李老先生给我介绍了李家后来的变迁、今天宋寨李家繁衍状况及今有轩得以存世至今的情况。后来,我从宝丰张显明老师处得到台湾宜兰大学吴秀玉教授的研究专著《李绿园与其<歧路灯>研究》,说吴秀玉是宝丰老乡原濮阳寇兆人高双印的夫人,中州书画社出版《歧路灯》以后,高双印、吴秀玉夫妇利用探访故里的方便作李绿园和《歧路灯》的调查,著成此书。

2009年,平顶山学院党委副书记张清廉教授牵头成立伏牛山文化圈研究中心,邀我作顾问。我和他一起策划召开“海峡两岸《歧路灯》学术研讨会”以推动平顶山重要文化资源李绿园与《歧路灯》的研究。经过上下活动,取得省市领导的支持,广泛联络大陆各学术机构和高校的《歧路灯》研究力量及台湾的吴秀玉教授,于2010年8月25—27日召开了“首届《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我做了题为《浅谈李绿园的佛缘》的大会发言,梳理了李绿园生平与佛教的关系及《歧路灯》中的佛教元素,并作《学术综述》。此后又开了两届。2012年8月30—31日,“第二届《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召开,我就所提交论文《论徐玉诺对<歧路灯>的研究》作大会发言,将现代河南文学俊秀徐玉诺与古代文学家李绿园联系起来,并参与主持了学术讨论。第三届《歧路灯》海峡两岸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8月23—24日召开,我宣读了题为《李绿园的精神家园——李绿园诗文所及汝汝胜迹、文物、民俗之历史记忆考释》的论文,并主持了学术讨论。这三届《歧路灯》研讨会上承20世纪80年代河南省社科院所召开的三届《歧路灯》研讨会,并有所拓展和深化,将《歧路灯》研究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歧路灯》是一部警世小说,它警示社会,警示家族,警示世人。

元结的商余故里情结

袁占才

元结故里商余山位居鲁山西南,距县城约15公里。因为元结之故,我曾多次来此,寻觅这位名贯古今的唐代大诗人的活动踪迹。

2022年的十月金秋,我再次来到商余山,参加“元结故里遗址碑”揭幕仪式。当时正值野菊花盛开季节,遍山的野菊花金灿灿的,似在笑盈盈地欢迎我们的到来。1000多年前的元结尤爱菊,想当年,他到春陵(今湖南境)做官,发现那里是不种菊的,于是不惜千里迢迢从家乡携去菊种,植于前庭墙下,并作《菊圃记》,赞菊芳华可赏,在药是良药,为蔬是佳蔬,告诫贤人与君子要自植其身,慎择所处。他言道,菊“纵须地趋走”,难不成他带往春陵种的,就是商余山故居前的野菊?

我们下车后,涉过肥溪吊桥,登上起伏的商余山,下至药王庙西侧一湾,此处即碑处。碑前是一片平畴沃野。对照元结《述居》察看地形,可以肯定,诗人当年就是在此耕读生活的。目视元结曾经耕灌过的田地,今都种成了参天之杨,直似元结之忠直性格。溪水不见,溪沟尚存;那口泉井,有心人用砖筒单砌了起来。山野寂寂,我们一行人的到来,打破了这里平日的宁静。笨眼巡观,这里依山傍水,田土肥沃,的确适于修身。佩服岳父元延祖,千年前居然以“鲁县商余山多灵药,遂家焉”,择此佳处定居,培养出一位香溢百代的诗人。

参与揭幕仪式的多地学者,亦有村民,都怀着对元结的景仰而来。秋阳朗照下,蒙碑的红绸布被缓缓拉掉,“元结故里遗址碑”呈于眼前。面对精雕细刻的巨碑,人们合掌躬身,致敬元君,感叹1200年后诗人英雄回归。

这块碑的刻立,酝酿了多年,今由县炎黄文化研究会、县文联借商余村共同勒石。忆及前几任,在药王庙的前左前方,县书法家协会也曾竖过一块“元结故里碑”,碑仅几个大字,未有题记,陌生人看了,难知根源。今立之碑,正刻“元结故里遗址碑记”,述碑缘由,记诸公奔走鼓舞之功;背刻元结于此所作《述居》一文,让人遥想元结在这里耕读之情景。



元结塑像

人杰地灵商余山

《述居》仅300来字,叙商余地形,言山东有谷,谷有泉田,泉可浸蔬。泉合肥溪,溪流出谷,合汇于溪。元结在此,占山泉,辟榛莽,依山腹,垦丰年,习静保闲,耕艺山田,兼备药石,与兄弟承欢于膝下,与朋友和乐于琴书,不为物累,怡然自得。

商余山又名笔架山、长寿山,山虽不高,却绵延逶迤。山上多原始次生林,植被良好,杂花遍地,野生药材比比。有人统计,这里产植物类药126种、动物类药21种、矿物类药7种。“商余灵药”,古语著名八景之一。昔年,自商余至溧阳,绵延20余公里的薛店街专营中药材,有药不经商余不灵之神谓。

元结在商余,潜心两汉古籍,以致诗文超迈六朝。漫步在故居碑前后,元君耕种习读之景仿佛在眼前。他的一生,怀有宁静闲适的心态,亲民旷达的情怀,皆得于家乡山水的滋养。我想,他人生的理想与追求,最初定然不是做官,而是为文,是做学问。他的诗文,有田园牧歌式的闲适。其《赋诫示官吏》“昔岁逢太平,山林二十年。泉源在庭户,洞壑当门前”描述的就是青少年时,他在商余山悠然自得、边耕作

边读书的场景。

当然,元结的诗,诸如《贫妇词》《去乡悲》《春陵行》等,更多的还是反映民生疾苦。仔细品读,我们可以感受到,他笔锋犀利,情感激奋,词意幽远,格调高古。难怪欧阳修赞他“笔力雄健,意气超拔”,杜甫誉其“道州忧黎庶,词气浩纵横。两章对秋月,一字谐华星。”清末古文家吴汝纶评论其“放恣山水,实开子厚先声”“文字幽妙芳洁,亦能自成境趣”。史学界说他开了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先驱,称他是上继王勃、陈子昂而起,中与杜甫并肩努力,后为白居易的新乐府开路,在中国文学史上有着承前启后的功绩。

这种定位,何其高也。

灋河与灋溪

站在商余山上,西眺南望,但见层峦环绕,嵯峨叠嶂,山雾苍苍,云雾缥缈,免不了思起千载,往事回溯。元结,字次山,布衣历官,出仕后,不十月,连升9级,至尚书郎。因其忠直方正、文武兼备,被平顶山市和鲁山县评为十大历史名人之一。他不单诗文绝佳,更重要的是,他领兵征战,威震四方,心怀报国,清德卓行,忧国忧民,刚正不阿,敢言心声,诚信化人。我曾登临《西鲁讲堂》,讲述《广西鲁山的成语》,其中“断章摘句”“欺上罔下”均典自元结。“断章摘句”是诗人李商隐称赞元结文思敏捷,随意裁断章节,点缀修饰,就做成了好文章;“欺上罔下”说的是元结初任道州刺史,哀生民涂炭,上书《奏免科率状》,言“西原蛮”陷城后,道州百姓“十不存一,资产皆无,人心嗷嗷,未有安者”。元结情真意切,恳请皇上免除道州所负税课,如果所奏“不合时政,干乱纪度,事涉虚妄,忝官尸禄,欺上罔下”,愿受刑典。似此冒着被降职甚至被杀头的危险为民请命,老百姓岂会忘记了他?

元结的踪迹,涉江西瑞昌、湖南道州、广西容州等,千百年,这些地方的民众都在采用不同的方式方法纪念他。元结绝不会想到,因家乡商余山水之熏染,他的人生履痕,一路歌之咏之,经过1000多年的沉淀,竟都成了古

迹名胜,成了国家的文物。

因避安史之乱,元结最先的寓居之处在瑞昌灋溪。在那里,他作了《与灋溪邻里》《喻灋溪乡旧游》等诗,诗中记述了他与灋溪人深厚的感情。上世纪80年代,灋溪人专在长江岸边建了一座灋溪亭,用以怀念他。商余山西亦有灋河,与灋溪一样,同为淮河流,下泄入灋。是古鲁的灋河之名被元结移到了瑞昌,还是瑞昌的灋溪在先,在元结回归故里时,把它引至老家?我说不清楚,也难考据,但不可否认的是,二者的同源牵系。

元结的灋溪之缘

更奇的是元结的灋溪之缘。元结与灋溪,二者仿佛就是一个整体,拆开谁,都会成为一种虚无。安史之乱后,结以讨贼有功,摄监察御史,任道州刺史,数过灋溪。前两次,因杂事缠拌,对于湘江河畔这一处山石小景,他没有过多的欣赏;第三次,他心情舒畅,看着山脚下的一脉清溪,望着山上那形态怪异的山石,情不自禁生出感叹:“零陵郡北湘水东,灋溪形胜满湘中。灋溪石巖堪自逸,谁能相伴作渔翁。”元结定然是把南方此一山水,与家乡商余之景联系起来,否则,他不会无

端地、入骨地爱上了这里。爱之深,爱得不舍,心一横,他竟把家也安到溪边来了:“爱其胜异,遂家溪畔,修耕钓以自资。”他要将这条山溪“据为己有”,他要把这奇绝的自然山水,刻进自己的灵魂。之后,元结干脆把这条山溪取名叫“灋溪”,把溪流右侧一个石台命名为“晤台”。在《灋溪铭》中,元结感慨道:“园林之美,豪富所私;山川之胜,天下公之;公者千古,私者一时。”那意思,它虽是我的溪,我的台,我的亭,实则是大家的,是共有的,是精神家园。因元结命名之灋溪所在地祁阳市,今有“三吾大地”之称谓。更加令人惊叹的是,面对灋溪旁的悬崖陡壁,元结请来能工巧匠,把好友颜鲁公饱蘸笔墨书写的《大唐中兴颂》刻在了石壁之上。因辞之古雅,书之瑰伟,历代文人骚客慕名来此观瞻者比比,竟又留下500余方诗词赋文摩崖石刻,于今,这些石刻都成了国家文物,灋溪碑林,成为江南最大的摩崖碑林。灋溪,也晋升为国家4A级景区。

当年的灋溪之景,比之老家商余,真的好吗?我想也未必。但老家去去日远,一条溪流,寄托着诗人对老家商余的无限情丝,经了元结的梳理,再经了千年的熔铸,便有了文化的厚重。



位于鲁山一高附中院内的元次山碑

元结最后职所在广西,任的是容州刺史,兼容管经略使、容州都督,相当于军政一把手。治理容州,他并非武力镇压,而是怀着悲悯,情系苍生,赤手空拳,深入山区,会见瑶首,晓以大义,劝勉抚慰,歃血为盟,以心换心,从而“六旬而八州定”。当年在容州,他为操练士卒建经略台,后人又在经略台上建真武殿,今亦成了全国的重点文物、旅游景点。广西梧州有特产“冰泉豆浆”,源自当年元结驻节此地,游览梧东名泉,写下的一篇《冰泉铭》,铭中语句脍炙人口:“火山无火,冰泉无冰。惟彼清泉,甘寒可凝……”

相较之下,作为他的故里鲁山,包括商余山,并没有更多有关元结的遗迹可寻。他于公元772年去世后,被运回鲁山青条岭(今属石龙区)安葬。青条岭应也是元结本人选择的永久安息的地方吧。为什么没有运至商余山安葬呢?那是他对鲁山的一种眷恋。商余山与青条岭,鲁境之南一北,地势相仿,其英灵在此,或可枕青山,遍览鲁山之胜,祈福家乡康宁?所幸,他的墓铭也是由颜鲁公巨笔撰书,那碑,原是立在青条岭元君家上,其后数百年,因风吹日晒,剥蚀严重,得有识之士,于明代移至鲁山文庙内,盖碑亭护之。

和墨子一样,元结根植家乡。这样一位广受爱戴的军事家、文学家,在他的旅居之地,尚且有那么多的文化古迹遗存,而在其出生之故地,却是山川旧貌,几乎没有一丝可供凭吊怀念的印痕。这实在有些遗憾。今在其故居前立起一块遗址碑,虽不足挂齿,却也说明鲁山人民没有忘记这样一位贤哲。

元结自称漫叟、漫郎、浪士,其一生漂泊在外。但我知道,他心心念念记挂着的,还是家乡商余这片热土。商余之于元结,那是他的根之所系;元结之于商余,那是他的情之所在。没有商余,就没有元结;没有元结,商余也是一片虚无。是商余,成就了一代文豪,是元结,使鲁山名播更远。我们期望,不远的将来,元结文化开发,能够在他的故里抑或故居拓展出一片新的天地。

(图片由袁占才提供)